容闳的维新中国活动

肖一亭（珠海市博物馆副 研究员）

Rong Hong is one of the greatest thinkers who proposed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reform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Rong Hong's thoughts of being governed by people, saving China through education and developing national industry were not accepted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se thoughts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later reform movement. Rong Hong's thoughts reveal a road from reform to bourgeois revolution for democracy.

Key words :Rong Hong Reforming China

内容提要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全面系统提出维新中国的先进的思想家之一。容闳的建立民政政府、教育救国、发展民族工业的维新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采纳，却为变法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容闳的思想体现了一条从改良主义逐步走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关键词 容闳维新中国

1854年，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进一步学习的打算和在美国寻求发展的良好机会，踏上了归国的征途，开始了他“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艰难历程。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珠海南屏乡（原香山县）。这里距澳门很近，只有一水之隔。当时他家境贫寒，一家六口，全靠父亲的劳作为生。7岁时父亲带他到澳门，进了英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小学念书，不久辍学回家。1840年，父亲病故，他只得做起提篮小卖，以微补家用。1841年通过霍白生医生，他又进入澳门玛礼逊学校读书。当时主持该校校务的是美国传教士勃朗。容闳聪慧伶俐，学习用功，成绩进步很快。1846年勃朗因身体原因准备回美国，他同意带容闳与黄宽、黄胜几位学生赴美学习。

1847年4月，容闳一行到达美国。这里给容闳展现了一个与大清帝国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们先入麻萨诸塞的孟松中学学习，生活费用和学费全靠教会津贴和勤工俭学。1850年，容闳和黄宽在孟松中学毕业，黄宽去美国爱丁堡大学学医。容闳向往著名的耶鲁大学，他的恩师勃朗先生就是耶鲁大学毕业生，1832年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他希望留在美国继续读书，但苦于经费尚无着落，因为原玛礼

逊学校所能提供的经费是在美国学习两年。事实上当时容闳已经了解到孟松中学愿意为他提供经费资助，但有附加条件，即毕业后回中国作传教士。当时，如果容闳答应这个条件，则经费上有保障，可以很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但是，这时的容闳，已经有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认为“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有用之身，必致无用”^[2]。他拒绝了在回国当传道士的志愿书上签字。

果然天无绝人之路，由于勃朗的积极活动，乔治亚省萨伐那妇女会会员同意资助容闳上大学。1850年夏，容闳如愿以偿考上著名的耶鲁大学。

容闳入世知事之时，正是清朝腐败，外强入侵中国之时。国家民族处于被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地位，经济和科学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经过长期和系统的西方教育，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深的了解，而亲身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目睹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的容闳，已明显意识到祖国的落后与危机，并为之忧虑：“当时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3]。而强烈的爱国心，使他决心“日夕图维，以冀平生所学，得以见诸实用”^[4]。

他当时就意识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受到西方教育，了解西方文明是无济于事的，要造就许许多

多懂得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说,掌握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中国同胞来改造中国,使祖国成为文明富强之邦。这时,在他的脑子里已形成了维新中国的具体计划:“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他决心劝说清政府,大量派遣留学生。

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中国学者,取得美国耶鲁大学颁发的文学士学位羊皮纸文凭,这在当时,确属“稀贵之荣誉,为常人所难得。”当时他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并入基督教,完全可以继续在美国深造,或谋求一个体面的工作,但他深知古老而落后的中国需要他去唤醒和维新,随即乘“欧里加”号行13000海里,经154天回到祖国。

二

容闳满怀着维新祖国的热忱和希望踏上故土,迎接他的却没有鲜花和笑语。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仍然闭关自守,风气未开。

林则徐早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曾组织人员翻译西方报刊、书籍,编纂《四洲志》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和社会风情,提出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使中国也能“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被称之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时,魏源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自办船厂、炮厂,改造军队,加强海防,创办民族工业等,还主张改革弊政,都相当有影响。但是,《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诸统治者偷安一时,地主顽固派重新抬头,重弹昔日闭关自守陈词滥调,把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称之为“奇技淫巧”,甚至提出禁用洋货^[5]。在一个极端顽固腐朽的封建专制的政治环境中,容闳“建造中华”的抱负困难重重,可以说他是既无门路又无靠山,在回国后的几年中他只得“谋食亦谋道”,一边工作一边寻找机会施展抱负。1855年,他在广州找到美驻华公使伯驾,企图通过他结识中国上层官僚,派留学生赴美,结果失败;1856年,他到上海海关,想通过洋人和清朝权贵拉上关系,1857年他在上海一面译书,一面通过一些社会名流结交清朝要员,这些均告失败。

1860年,容闳与曾兰生及两位美国教士一道访问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他与干王洪仁多次商谈,向其提出七条建议: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有学识军官;3.建设海军学校;4.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创立银行

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6.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为主课;7.设立各种实业学校^[6]。这七项建议,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是近代中国较早提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在这七条建议中有四条是关于教育的,他提到了军事教育:建议太平天国依照西方创办军事学校的做法,培养出一批素质高的军官,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陆军;他还提到实业教育、民众教育、年级教育,并要求颁行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全面提倡西方近代教育,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实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两条是关于经济的,要求设立银行和制定度量衡,便于发展资本主义,与西方国际社会接轨;一条是关于政治的,建议组织一更为民主的政府。

但是,容闳依靠太平天国来实行维新中国的计划未能成功。他的建议连同洪仁的《资政新篇》还未来得及实施,太平天国就被清军打得节节败退。

三

经过多次失败,容闳仍然矢志不渝,他称“余既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7]。1863年,经当时杰出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好友的推荐,容闳的才能被曾国藩器重,走上了通过洋务运动维新中国的道路。

曾国藩早在湖南举办团练训练湘军之时,就曾私自购买了不少洋枪洋炮。1854年,仅湘军水师就拥有洋炮600余尊,在湘潭、岳阳水战中,发挥了重大的威力。1863年,曾国藩拟设立一规模较大的“西式机械厂”。容闳积极进言,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机械化方案:“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8]。容闳高瞻远瞩,提出了建立机器母厂的计划。

容闳的这个计划与曾国藩建立近代兵工厂的想法基本吻合。于是容闳被授命全权赴美购办机器。经过近两年的奔波,1865年,他所订购的100多种机器运到上海,成为江南制造局的主要设备。由于此事劳苦功高,容闳被清政府授予五品候补同知,在江苏行政署任译员。在此期间,他又翻译介绍了哥尔顿的《地文学》和派森的《契约论》。1867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赴任前巡视江南制造局,容闳引导其参观美国购回的机器,并乘机提

出了设立兵工学校的设想，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这个兵工学校的设立培养出大量的中国机械工程师。

1868年，容闳向清政府提出以派遣青少年出洋留学为主要内容的四项建议：1. 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2.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为15年，……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3. 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4. 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

容闳的这四项充满着爱国主义的建议，强烈要求中国自主图强。当他得到曾国藩等四大臣将联衔入奏，请政府采纳他的“教育计划”时，容闳高兴得夜不能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容闳为“教育计划”而奋斗，成为中国留学教育的奠基人。经容闳的紧张筹备，1872年第一批学生30人渡太平洋赴美国留学，接着连续4年，每年派出30名青少年赴美留学，共120名。为了使清政府把这件事情成为定制，容闳说服清廷在美国哈特福德克林街设立坚固壮丽的中国留学生事务所。这项留学活动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福泽渝吉在他的名著《文明论概略》中都提到：“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在为幼童留美事奔走的同时，容闳也在家乡南屏乡宣传办学，并于1873年正式建成“容氏甄贤学校”。幼童留学时间原定以15年为期，但不久清政府中的顽固势力以担心青少年生活方式西方化，无益国家为借口，决定全部撤回官派留学生。此次留学运动被顽固派势力所扼杀，但这批留学生后来大都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栋梁，涌现出象詹天佑、邝荣光等一批科学家；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廷干等政治家、外交家；蔡绍基、唐国安等一批教育家；钟文耀等金融家；吴应科、徐振鹏等军事家，为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输入中国，为国内新式学校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这对容闳的教育救国计划是一个沉重打击，使他认识到依靠洋务派来维新中华，终难成事，必须从根本上实行改革。从此，他与洋务派分道扬镳。

四

不久，他的美国妻子又忽病逝，使他雪上加霜。但是，强烈的爱国心和坚定的信念，使他继续为维新中国而奔波。1896年，他游说政府设立国家银行，并将美国关于中央银行的法律译成中文以供政府参阅。他提出：“先设总银行于京都，续设分银行于各省城及通商口岸。总银行资本以一千万元为额，统由户部筹拨，钦派大臣督办，并派大员总办，分银行即由督办、总办陆续招商集股，择地开设。”并就印发券票、扩充分行、兼管铸造等问题作了说明。列总行章程十二条，分行章程二十四条^[9]，又列《续拟银行章程》^[10]等，陈述薪水、房屋、事权等问题。此事本来进展顺利，不想盛宣怀贿赂官员，阻碍其事，将银行资金抽作它用。

接着，容闳又提议建筑津镇铁路，拟借美国“商人之财才，而权我自操。”他拟定章程，确定范围，并拟附设铁路学堂，“专选聪颖弟子，教以筑路行车，并熔炼钢铁之法，日后人才辈出，即可自行管理”^[11]。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掀起反对割地求和，拒签《马关条约》的浪潮。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签名上书，提出“变法”主张。接着，康有为、文廷式在北京编发《中国纪闻》、《强学报》，刊载中外政治新闻，鼓吹变法图强；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变法，刊载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等，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一时间改良思想形成一种维新的政治运动。而容闳正是这一维新思潮的先声和维新思想的先驱者。在维新运动中，容闳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1896年，容闳结识康有为与梁启超，并相互支持。

当时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刊载了容闳关于银行铁路的几乎全部章程和条陈，大力宣传，并加上编者按：容闳“所定银行章程，妥密精当，最无流弊。至办铁路，但借西人之资，即以铁路余利为息，并按年除本，建二十年后，即可本利还清，尤为权自我操”^[12]。

1898年4月康有为发起保国会，第一天容闳也到场。“百日维新”期间，他在北京的寓所成为维新派议事的中心，“一时几变为维新领袖之会议场。”容闳较康有为年长30岁，较梁启超大45岁。作为他们的师长，受到尊重。戊戌变法中康、梁等

人也拟将一些重大问题交由容闳办理，推荐容闳赴美借巨款作为修筑全国铁路，练百万精兵，购铁舰百艘，并于各地广设新式学校和开银行等统筹大局的费用^[13]。都可见容闳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发挥过重要作用。

容闳相当推崇光绪皇帝，认为他“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光绪当亲政后，颇思革新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他认为光绪是中国革新的先导，中国的伟人。

以救国图存、富国强兵为宗旨的维新运动不久被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扼杀。当顽固派策动政变时，容闳积极参预营救同志的谋划。政变发生后，他曾致函李提摩太，请求营救梁启超。由于支持维新变法，他自己也被迫逃至上海租界避难。在上海，他继续进行维新中国活动，慨然纠合同志，组织“中国强学会”以讨论关于维新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1900年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亦称中国国会）。7月1日召开“中国国会”，与会者有各地维新派代表人物80余人，公推容闳为第一任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容闳在会上“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14]。其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失败，容闳也只好到香港避难。以后，容闳又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一个改良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路人。

五

容闳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他自小接受西方教育，在美国生活多年，亲自感受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自觉地负起了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的责任，并为之而不懈奋斗。

容闳是较早全面系统提出维新中国的先进的思想家之一。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了要建立民政政府（即君主立宪制政府）的主张。“教育救国计划”是容闳维新中国的重点和核心，他身体力行的留学生涯和经他呕心沥血10多年奔波呼吁而成的中国政府首批官派留学生赴美留学，为中国留学教育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容闳提倡的近代学校教育对否定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学

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的民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他很早就提出过设立银行、创办机器母厂、组织轮船公司、开采矿产、兴建铁路的主张，他要求清政府允许民间“自设公司，假以权事，用专责成”^[15]。他亲自赴美购办机器，客观上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容闳的维新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全面采纳和实行，有的维新方案在实行之后又被中途废除，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文明开化程度低和社会风气趋于保守所决定的。日本明治时期的学者也都认为“中国与西洋各国相比，不能不说中国是半开化”^[16]。可悲的是，当时中国的民众和上层官僚还不以为然。“人人沉睡而我独醒”，只有像容闳这样的少数先知者，才看到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他忧国忧民，奋力抗争。他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要造就更多的人材为国家所用，于是形成了他的“教育救国”计划为核心的维新方案。从戊戌变法运动的表面看，容闳的作用比不上康有为、梁启超，但是，他长期的维新中国活动，已经造成了一种时势，积蓄了力量，为变法运动的兴起做好了铺垫，其作用不可低估。更难能可贵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容闳本人的思想也不断进步，从改良主义者逐步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1][2][3][4][7][8]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3、19~20、22、28、68、7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5] 管同《因寄轩文集》，《禁用洋货议》：“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心……”。

[6]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57页；第四条：善良政府，袁鸿林认为当为“民政政府”，见《容闳述论》，《历史教学》1983年第3期。

[9] 容闳：《请创办银行章程》，《时务报》第九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10] 《时务报》，第十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11] 《铁路条陈》，《时务报》第十册。

[12] 《时务报》第十册。

[13] 《康南海自编年谱》：“……荐容纯甫熟悉美事，忠信可任借款”。

[14] 孙宝宣《日益斋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稿本，上海图书馆藏。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商务印书馆。

[1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16] 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明治八年，商务印书馆1954年译本，第10页。